

挑战与应战

一个欧洲纲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弗·约·施特劳斯著

挑 战 与 应 战

一个欧洲纲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Franz Josef Strauss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 programme for Europ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enry Fox

Atheneum, New York 1970

根据纽约文学协会出版社 1970 年版英文版译出

挑 战 与 应 战

一个欧洲纲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著

英译者 亨利·福克斯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27,000

1976 年 7 月第 1 版 197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91·190 定价: 0.51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于1915年生于慕尼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纳粹军队，1945年参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创建工作，1953年进入阿登纳政府，先后任特别任务部长、原子事务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66年又任库·基辛格政府的财政部长，1969年去职。现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联邦议院议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施特劳斯是慕尼黑一家飞机公司的监事长，代表西德一些尖端工业部门，特别是与军火生产有关的垄断财团的利益，在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联邦议院拥有相当的实力。

施特劳斯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一贯反共。他的政策主张具有强烈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色彩，对德国战败的结果和德国的分裂状态极为不满，念念不忘恢复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企图重建德意志帝国的霸权地位。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他的政策思想

也有一些改变和发展。他认为，西欧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抗衡美苏，才能改变德国的“侏儒”地位。他主张建立“欧洲合众国”，“通过欧洲统一，达到德国统一”；并主张联合美国，借重中国，从两面钳制苏修。施特劳斯的《挑战与应战》一书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上述政策思想。

今天，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欧洲的形势下，特别是在苏修大力扩充面向欧洲的军事实力，战争因素正在增长的情况下，欧洲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苏修扩张的威胁，认识到欧洲联合起来摆脱两霸控制的必要。施特劳斯出于他本阶级需要而提出的某些观点，正反映了欧洲当前的这种思潮。本书对于了解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和欧洲一部分政界人士的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施特劳斯在本书中多处对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进行诽谤攻击，甚至胡说当前苏修的“很多理论又恢复到斯大林时代”。作者在谈到我国的内外政策时，也进行污蔑和攻击。对此，我们必须严加批判。

本书译文是根据1970年版英译本翻译的。错误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1975年10月

目 次

前 言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 1
一 欧洲的兴衰	11
二 新的开始和“遏制”	31
三 从战争的退化到“原子统治下的 和平”	46
四 大国间紧张局势的缓和	73
五 有“黄祸”吗?	99
六 欧洲紧张局势的缓和	116
七 一个由各民族组成的欧洲吗?	133
八 德国——一个欧洲问题	152
九 科学和技术的差距	176
十 欧洲的安全	205
十一 做未来的主人	231
后 记	246

前 言

一位在职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部长，又是他本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竟然要求一个法国人为一本即将在这位部长本国出版的书写前言，这样一种做法倒是不寻常的。鉴于德国问题是本书的中心议题，这就更加不寻常了。一个非德国人不可能怀有象施特劳斯先生一样的同情和见解来处理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指望他在这个问题上会象施特劳斯先生一样发挥同样的专门见解。

施特劳斯先生肯定热切希望一个法国人来证实这样一种看法，即德国问题同整个欧洲有关。谁也不会反驳他这个观点。面对着其他欧洲人正在被剥夺自决权的这个事实，法国人和欧洲人是决不会无动于衷的；面对着这样一种剥夺，一个出于民族主义意识的德国人也许怀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德国的重新统一只是一个与他自己有关的问题而已。施特劳斯先生却对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你们单从民族国家的立场来对待重新

统一这个问题，你们肯定会吓坏你们的邻国，因为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无疑会成为俄国西面最大的欧洲强国。他还向其他欧洲人说：如果你们希望避免出现这样一个过分大的德国，你们就必须保证德国成为联合的欧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任何一个欧洲人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已经出现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可以建立一个适应当代世界需要的共同体。现在该由我们大家来作出保证，使得我们的后代，不论他们是皮埃蒙特人，巴伐利亚人还是勃艮第人，将来不会责备我们给他们留下一个没有他们的发言权、在发展过程中他们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世界。施特劳斯先生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坦率地讨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全书都激发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不是光靠面包，或者汽车生活的。安德烈·马尔罗曾说过，正是人的雄心壮志才保证他的行动“在地球上留下痕迹”。因此，施特劳斯先生在回答欧洲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大国时，既不矫揉造作，也不闪烁其词，而是毫不含糊地说“应该”。在这个“应该”背后有两种不同的现实。一种是我所熟悉的，并且已在拙著《美国的挑战》一书中试图论述过。欧洲所要解答的问题在今天和将来都不亚于技术、科学和文化方面所要解答的问题。另一种现实属于由来已

久的政治方面。这方面的问题是要设法说服苏联同欧洲人自己来讨论欧洲的前途，而不局限于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进行对话。在这方面施特劳斯先生正在考虑一个联合的西欧，它迟早可以自行掌握包括核力量在内的一切力量。

这样一种远见含有对现状抱着深刻怀疑的意思。它自然也不免有它自己的危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危险同维持现状必然会产生的那些危险权衡一下。欧洲目前的形势取决于两个基本特点：东方未能实现任何真正的一体化，西方也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

斯大林从青年时代起就全神贯注于苏联的民族问题。1918年1月，他发表了《俄国各民族自决权的宣言》。在他心目中有两个战术目标：要在各地复兴民族理想和地方语言；但是，同时，一个权力无限的党将保证所有政治和经济事务都要受到不容争辩的中央集权的控制。这项政策得到了极端无情的贯彻。为了使人人都感到他是在享受着独立的文化，甚至采取措施采用以前几乎还不知道是否存在过的语言和方言。另一方面，每个地方苏维埃主席都有一个党的书记同他在一起，这些书记大都是俄罗斯人，他们掌握了真正的大权。尽管使用了恐怖和宣传的手段，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

个事实，即人民在参与苏联的经济发展工作方面都具有真正的兴趣——在那种提供真正机会均等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从而使这个制度得以维持至今。

然而，把这种制度应用到东欧的时候，它却失败得很惨。克里姆林宫在允许东欧各国有一种虚伪的民间传说似的民族主义存在的同时，特别注意在每个共产党中设置一个可靠的、能够按其意旨办事的领导集团。这样一来，东欧的军队，政府和经济都被殖民化了。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胸襟狭窄的政策确实大大破坏了苏联的原来的希望。不是容许东欧国家来参与整个地区的发展工作，而是通过战争赔偿和实行不公平的汇率，迫使它们对苏联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比苏联对他们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此外，由于没有可以兑换的通货，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因而大大缩减，使得它们不得不完全依赖苏联并因此感到丢脸。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民族意识毕竟多少比土库曼人更为发达，因此不久，他们就开始认为这种局面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他们与土库曼人不同。他们容易受到广播影响，他们只消打开收音机，就能发现，正在他们家门口，在西欧，富裕和自由是可以并存的。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1968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我们也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一个国家的

社会主义”。然而，这种“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肯定将导致各个国家的不同发展。在捷克斯洛伐克刹那间出现的那种可以说是民主的东西，如今却在波兰大有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甚至成为仇视外国人和排犹主义之势。至于东德，它有朝一日会实现一种普鲁士式的社会主义，而在那儿的新领导也许会同易北河彼岸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民族进行单独对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苏联人所建立的制度就将最后崩溃，苏联也许会不得不再采取那种已使我们尝到了滋味的、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暴力行动。

与此同时，西方建立一个联邦的种种努力没能成功，尽管美国人顶住了诱惑，不参加那种由来已久的分而治之的活动，但是，他们在发起马歇尔计划时，就相信这个伟大理想。然而，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在许多德国人的眼里，将要建立的欧洲，不过是可以肃清纳粹主义罪恶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而自从路易十四以来就习惯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法国人，却没能看到超国家结构这个概念，在帮助各国人民保持和增加他们自己的遗产方面具有多大的价值。至于战后肩负最大责任的美国人，他们往往混淆了“领导”、“共同体”和“伙伴关系”这些概念。这些误解由于欧洲防务集团计划的告吹而在1954年达到了顶点。不少德国人把这个

计划只看作是他们自己获得复兴的手段；不少法国人则把它只看作是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主权；而不少美国人把它看作不过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搞成功了，然而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丝毫改变这种形势。的确，自由贸易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同过去旧的保护贸易的习惯作斗争中是有用的，但是，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一项大有前途的工业政策付诸实施。

一家袜厂固然可以很好地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市场里；但是，就电子和飞机工业说来，欧洲经济共同体还不够大。这方面需要的是国家干预。施特劳斯先生非常正确地指出，美国每年花在研究工作上的二百亿美元中，三分之二来自国家的补助。然而，我们没有“西欧合众国”。由于没有共同的税收制度和预算，没有一项共同的政策，西欧不得不同重复和浪费作斗争。结果是，西欧企业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它们必须使自己成为更强大的美国企业的附庸，或者必须按照法国“计算计划”的精神，满足于耗资巨大的民族冒险事业。总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西德基本上还是过去的民族德国，而东德早晚可能会走同样的路，以致我们有一天也许会看到，德国人民沿着欧洲各国人民，首先是俄国和法国制订的规章中所没有料到的那条路线实现重新

统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面对的将恰恰是阿登纳总理毕生担心和告诫的那种爆炸性局势。

那么施特劳斯先生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其强大足以迫使苏联全面地重新考虑欧洲问题，这个建议本身含有什么危险呢？在理论上说来，有这样两种危险：欧洲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的孤立以及苏联可能被迫退回到一种隔离的状态。

施特劳斯先生比谁都清楚，要真正解决我们的国际货币问题，必须由一个联合的欧洲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他还认识到，要解决世界土地问题，特别是大量饥荒问题，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援助，也都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然而，必须承认，美国也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些影响，并且如果它一心认为一个联合的欧洲，其唯一可以想象的用处只是作为军事强国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在这类计划中的合作将给人以一种更加虚伪的印象。

虽然施特劳斯先生不打算打一场核战争，甚至认为这种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他排除任何诉诸威胁或讹诈的手段，但是他坚决主张，同苏联进行任何谈判必须从实力地位出发，不仅是从经济实力也从军事实力地位出发。对于这种想法，人们至少会说，应用这种想法将给世界政治引进一个新因素，而这种新因素

可能是危险的。尽管如此，如果这种做法确实会为一种成功的政策提供秘诀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因为这种担心而使自己束手无策。然而，如果我们轻率地对待苏联的告警叫声，我们就未免太没有头脑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苏联决不会忘记上次战争中丧失了二千万男女。此外，尽管它有巨大的武器库，这个庞然大物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弱点。法国在1968年5月所发生的爆发事件^①及其众所周知的后果，较之有朝一日苏联可能发生的事情，简直是算不了一回事。这儿所讲的这个国家，虽然它让本国的所有孩子接受现代化教育，它同时却禁止青年具有自由思想和自由生活。也是这个国家，辉煌的技术成就似乎和引人注目的经济衰退相结合，那里有了卫星，同时却缺乏煎锅。这个国家由于得不到满足的要求不断增加，有些要求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而其余的要求肯定会在今后的这个世纪中出现，人们怎会看不到，这么一个国家的形势必然会充满着种种巨大的危险呢？人们怎能认为这么一个国家会在没有对等的让步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实力感到放心而接受它认为是它安全保障的这种世界制度的崩溃呢？我们应该向苏联提出的不是核威胁，甚

^① 指1968年5月6日至26日法国发生的革命风暴，学生总罢课，随后有一千多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译者

至不是一种含蓄的威胁，而是一项庞大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个联合的欧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应该向它提出的东西。

实际情况是，欧洲和美国目前并没有在原子军备方面进行真正的竞赛，欧美竞赛的结果如何，要看哪一方届时能向俄国提供有效的工业援助。一个虽然在军事上已经组织起来，但在经济上不如美国的欧洲，必将失去通过谈判解决欧洲问题的真正机会。

1954年欧洲防务集团的失败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教训。在我们的时代，手指放在原子扳机上的欧洲权威只能是一种幻想！施特劳斯指出，德国人反对任何歧视人的企图。通过公众投票选出联合的欧洲的总统还需要许多年，在选出总统之前，鉴于东欧的分崩离析，欧洲和苏联之间早就有必要认真谈判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最小限度地废除政治主权，以便建立西欧所需要的那种有效的经济组织，也就是政治组织，但还不是军事组织。

我们不要忘记，西欧国家加在一起，现在拥有可供使用的黄金和货币储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还多。然而，这些储备因为不能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冻结的。法国目前所经历的情况表明，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们仍然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就是脆

弱的，因而在政治上也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毅然地采取行动结束这种状况。联合的欧洲依靠它的工业力量和自由的政治制度，而不求助于军事威胁，就能成为一个吸引东方的焦点。这是支配我们时代那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对抗的新规律：它们的想象力能够鼓舞各国人民和改变世界地图，而核武器由于相互抵销，仍然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得感谢施特劳斯先生，因为他使我们开始了对话，并考虑这些决定性的问题，而使我们不至于被民族主义偏见所蒙蔽。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

一 欧洲的兴衰

要求欧洲在政治上联合，并誓为联合竭尽全力，这在德国，远比其他国家更成为一种风气。凡是政治家，事实上，不论是什么身份的演说者，不论属于什么党派团体，不论在什么场合发表演说，都不能不至少在口头上赞成这种理想，尤其是目前欧洲的潮流似乎正在高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自从“大西洋浪潮”那种探索大西洋两岸各洲联合起来，是否具有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可能性的热忱开始低落以来（这部分是由于美国人对这个想法采取冷淡态度），我们似乎又看到“欧洲理想”重新行时起来。“欧洲”再度成为政界人士风靡一时的话题，在这些人中，至少有些人迄今还不准备坐在美国盛情安排的政治大看台的舒舒服服位子上，当一名超然局外的观众，观看世界舞台上的大事。他们不准备接受捉摸不定的未来可能为他们准备的任何命运。但是，我们真正看到欧洲理想在欧洲广大地区复兴了吗？现在发生的是否不如说是欧洲的“无可奈何的心情”